



汉语词缀研究的历史分歧及其解决途径

蔡华祥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词缀是汉语语法学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语法单位,从研究初期词缀类术语的纷繁多样、莫衷一是即可见一斑。而赵元任、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等诸位大家对于汉语词缀的看法“小同大异”,只有“子”、“儿”、“头”等少数词缀为各家所认可。汉语具有丰富的文献和复杂的方言,这为汉语词缀研究分歧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解决汉语词缀研究的相关问题应该以典型词缀的研究为切入点,而结合历代文献考察汉语词缀的历史演变和结合方言考察汉语词缀的功能及其地理分布,是当前汉语词缀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词缀;分歧;虚化;地理分布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6)05-0069-07

自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学术界在20世纪50年代对“汉语词类问题”、“汉语的主宾语问题”、“汉语单句复句划分问题”等学术焦点话题进行过大范围的专题讨论,并且在重大的学术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汉语是有词类的,但是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汉语的句子分析应该采用层次分析法,而不是“中心词”分析法等等。但是,学术界对于汉语词缀研究的诸多方面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确定汉语词缀的标准是什么,汉语有多少词缀,汉语的词缀和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缀在本质上是否相同等基本问题,在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著名汉语语法学家马庆株指出“在现代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中,认识分歧之大,术语分歧之大都莫过于词缀”^{[1][54]}。韩陈其则进一步认为,形成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自然的本质特点缺乏认识、对

汉语的特点缺乏认识、对汉语史缺乏认识”^[2]。问题的出现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开端。因此,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汉语词缀研究进行相关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汉语词缀研究的历史

汉语词缀研究有较长的历史,随着汉语语法的不断成熟,相关的成果也不断的涌现。不过,早期汉语词缀的研究在“词缀”这一术语的定名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引人注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术语的精确化是现代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和众多的语法学术语一样,“词缀”这一术语也是来自西方。在汉语语法学史上跟英语的通用术语 affix 对应的术语除了“词缀”之外,还有“记号”、“语缀”、“接辞”,词缀的下位概念除了“前缀”、“中缀”、“后缀”之外,还有“前附号”、“后附

收稿日期:2016-04-26

作者简介:蔡华祥(1981-),男,江苏盐城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语言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7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YY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4000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4ZDIXM032)



号”、“词头”、“词嵌”、“词尾”、“接头辞”、“接尾辞”、“前置成分”、“后置成分”、“前加不自由语素”、“后加不自由语素”等。

1919年,薛祥绥在《中国言语文字说略》一文中最早明确的提出了“语根”和“语系”这一对概念,大致对应于词根和词缀^[3]。1920年,黎锦熙在《词类连书条例》中提出了“语尾”的说法^[4]。1930年,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中也提到了“语尾”,但是他将前缀对应的成分称作“语首助词”^[5]。1931年,瞿秋白在《普通的中国话字眼的研究》一文中提出“字根”和“字尾”,例如“子”、“儿”、“的”、“了”等^[6]。1942年,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将“词根”和“词尾”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提了出来,并分析了词尾的一些特点^[7];又于1979年出版的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出“语缀”的概念^[8]。1943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专章论及了汉语词缀问题,提出了“记号”的概念,“记号是一种附加成分,用来表示词或伪语的性质的”^[9],“记号可以分为前附的记号和后附的记号二种”^[9]。1958年,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中将前缀、后缀分别称为“接头辞”和“接尾辞”^[10]。1979年,吕叔湘将赵元任的《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翻译为《汉语口语语法》,在书中把“粘着形式”或“粘着语素”称为“语缀”^[11]。1982年,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将构词法中涉及的附加成分称为“词缀”,并将其分为“前缀”和“后缀”^[12]。总之,在汉语语法史上出现了大量词缀类的语法学术语。

表1 汉语词缀相关术语一览表

英文术语	吕叔湘	俞敏等	瞿秋白	太田辰夫	陆志韦	汪馥泉	王力
affix	词缀/语缀			接辞			记号
prefix	前缀	词头	字头	接头辞	前置成分	前附成分	前附号
infix	中缀	词嵌					
suffix	后缀	词尾	字尾	接尾辞	后置成分	后附成分	后附号

就“词缀”这一术语而言,随着研究的进一步的深入,也产生了不少新的下位概念的术语。如屈折词缀、派生词缀、构形词缀、构词词缀、自源词缀、他源词缀、真词缀(纯词缀)、类词缀(准词缀)、单音节词缀、双音节词缀、多音节词缀、语音化词缀、语法化词缀、语用化词缀、名词词缀、动词词缀、形容词词缀、副词词缀等等。由此可见,国内的语言学界已经逐步统一使用“词缀”这一术语来对应普通语言学理论中的术语 affix。但是,事实上术语名称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首先,不少汉语语法学家在界定词缀的时候,常常称“词缀”也可以叫做“语缀”,如吕叔湘、马庆株等认为“语缀”这一术语更能覆盖汉语中的相关现象。韩陈其则明确表示“语缀”跟“词缀”不同,“词缀”是复合词层面的术语,“语缀”是短语层面的术语,除此之外还有句子层面的“句缀”^[2]。那么,“语缀”、“句缀”这些术语背后的语言现象,是汉语特有的,还是其他语言中普遍存在,用普通语言理论如何概括,这实际上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词缀的下位概念前缀、后缀实际上也并未统一。《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来解释“前缀”“后缀”的:前缀是加在词根

前面的构词成分,如“老鼠、老虎”里的“老”,“阿姨”里的“阿”,也叫“词头”^[13];后缀是加在词根后的构词成分,如“作家、科学家”里的“家”,“规范化、绿化”里的“化”,“人民性、党性”里的“性”,也叫词尾^[13]。即“前缀”也叫做“词头”,“后缀”也叫做“词尾”。笔者在检索中国期刊网的学术论文时发现,目前仍有大量的语言学学术论文在描写“前缀”“后缀”相应的语言现象时采用“词头”“词尾”的说法。这实际上是语言学研究不成熟的表现,表明国内语言学界还未就“词缀”及其下位概念术语的名称达成完全的一致。

二、汉语词缀研究的分歧

由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编写的《现代语言学词典》指出“affix 是只能用来附加于另一个语素(词根或词干)的各类构形成分的统称”^[14]。一般认为,语法学理论可以分为词法学和句法学,词法学的研究对象是词的结构和功能,以语素为基本单位;句法学研究的是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以词为基本单位。词缀是语素的一种,和词根(root)或词干(stem)相对。需要承认的是,词缀

以及整个词法学的体系都是以印欧语等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归纳出的语言学概念,在用这一套方法理论来分析汉语词缀的时候,就需要总结出适合汉语等汉藏语系语言的概念和方法。赵元任、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四位先生是20世纪汉语语言学界公认的大家,下文将介绍他们对词缀主要看法。

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认为词缀(语缀)是虚语素,包括前缀、后缀和中缀。前缀有“阿”、“老”、“第”、“初”;后缀有“儿”、“子”、“头”、“巴”、“们”(以上是名词后缀)、“了”、“着”、“起来”、“过”、“下去”、“法(子)”、“么”、“家/价”、“乎”、“得慌”;中缀有“里(糊里糊涂)”、“不(酸不溜溜)”、“得(看得见)”、“不(看不见)”^{[11][112-113]}。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认为构词法中的附加式是由一个词根(基本成分)加一个类似前缀(词头)、后缀(词尾)的附加成分造成一个词的方式。前缀,即类似词头的附加成分,有“第”、“老”、“打”(打扫、打扮)。后缀,即类似词尾的附加成分,有“儿”、“子”、“头”、“者”、“家”、“们”、“性”、“得”(懂得、认得)、“于”(在于、属于)、“了”、“着”、“的”^{[16][220-226]}。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没有提到前缀,但是着重说明了后缀(词尾),有“子”、“儿”、“头”、“的”(现代汉语)、“然”、“焉”、“乎”、“尔”、“如”等(古代汉语)。后来他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提到词缀(语缀)包括前缀、后缀、中缀,前缀有“阿”、“第”、“初”、“老”(老鼠、老虎、老师、老表)、“小”(小鸡儿、小孩儿、小辫儿)等,后缀有“子”、“儿”、“头”、“巴”、“者”、“门”、“然”等,中缀只有“得”、“不”(看得出、看不出)^[748]。朱德熙认为词缀是表示抽象语法意义的定位语素,前置于词根的叫前缀,后置于词根的叫后缀;前缀有“初”、“第”、“老”,后缀有“子”、“儿”、“头”、“的”^{[12][36-37]}。

四位语法学家从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角度出发,都认识到汉语中存在词缀这样的语言现象,主要表现为词缀附着在词根上这种附加式的构词方式。其中,赵元任指出词缀是虚语素,朱德熙则更明确提出词缀是表示抽象语法意义的定位语素。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汉语的后缀比前缀在数量上要多且复杂,他们一致认为汉语的“子”、“儿”、“头”是后缀,“第”、“老”是前缀。但是从上文

的描述来看,各家对汉语中哪些语素是词缀,汉语中有多少词缀,汉语词缀是封闭的类还是开放的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再如,陆志韦的《汉语的构词法》收前缀(前置成分)3个,后缀(后置成分)7个^{[16][126-133]};任学良的《汉语造词法》收前缀(词头)14个,后缀(词尾)43个^{[17][30-105]};刘叔新的《现代汉语描写词汇学》收前缀6个,后缀8个^{[18][85]};陈光磊的《汉语词法论》收前缀3个,后缀10个(包括“零后缀”),中缀3个^{[19][2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收前缀2个,后缀3个^{[20][213-214]};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收前缀2个,后缀13个,中缀3个^{[21][119-125]}。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发现,前缀最少的收2个,最多的收14个,后缀最少的收3个,最多的收43个,有的认为汉语有中缀,有的认为没有。我国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对词缀这样一个语法单位的研究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有着巨大的研究空间。

首先,对词缀的本质内涵仍需要进一步厘清。词缀是虚语素,那么虚化到什么程度算语素,标准是什么。词缀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那么它和虚词,特别是助词,如何区分。我们都承认,语素是一个语言中最小的、有音有义的单位。“词缀”是语素的一种,那么也必须是有音有义单位。可见,在描写分析汉语词缀的时候必须把握两条,一是词缀必须是伴随词根出现的,但是词缀又和词根不同。这主要体现在词根是复合词中理性意义的主要载体,而词缀承载的是附加意义。二是词缀是有音有义的语素,不是无意义的音节,词缀跟单纯词中的音节重要区别就在于词缀具有附加意义或功能。汉语的类词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没有厘清词缀、类词缀、词根之间的界限。将类词缀看作词缀,汉语的词缀就多,将类词缀看作是词根,汉语的词缀就少。类词缀是介于词缀和词根之间相对特别的语素。类前缀有“超”、“准”、“非”等,类后缀有“性”、“化”、“者”等,汉语的类词缀具有组合能力强、新生类推能力强、意义半虚化等特点。汉语类词缀的研究,既有利于加深对汉语词缀本质的认识,又有利于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应用方面的研究。

其次,汉语的中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一般而言,语言里的中缀比较少见。典型的如马来语中缀,例如:patuk(啄)、pelatuk(啄木鸟),“el”就是

插在词根中间的中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种美洲印第安语 Yurok 语中也有中缀，如 sepolah（田野，单数），segepolah（田野，复数），“ge”是表示复数的中缀^{[22][90]}。可见，中缀是插在词根语素中间的。汉语的“看得见”中的“得”和“看不见”中的“不”是中缀吗？从形式上看，“得”、“不”插在“看见”的中间，“得”、“不”就是“看见”的中缀。问题是“看见”是词吗？回答是否定的，词的内部一个凝固的整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看见”中间能插入“得”、“不”本身就说明“看见”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看得见”、“看不见”也是短语。可见，“得”、“不”是词，而不是词缀。“得”“不”作为一个词，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如“跳得高”、“跑得快”、“我的书不见了”等等，这些例子中的“得”、“不”跟“看得见”、“看不见”中的“得”、“不”是一致的。还有人认为“糊里糊涂”中的“里”是中缀。那么，“里”插在“糊糊涂”的中间，那么汉语里有“糊糊涂”这样的词根吗？显然是没有。可见，“里”不是典型的中缀。如果“里”是典型中缀的话，那么它的构词方式是这样的：“里”插在“糊涂”的中间，构成“糊里涂”。实际情况是，汉语里没有“糊里涂”这样的词。笔者认为，汉语“里”不是中缀，至少不是典型的中缀，“A 里 AB”式的构词方式需要另作研究。

三、汉语词缀研究分歧的解决途径

（一）汉语史视角下典型词缀的虚化轨迹

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其真正意义上的词缀并不多。而“子”、“儿”、“头”是现代汉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词缀，形成历史悠久，在汉语词汇双音节化、多音节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把汉语最典型的词缀演变轨迹理清，才能把握其他词缀未来的发展方向。

据《说文解字》，“子”即“幼儿”。可见，“子”的本义是子女、小孩的意思。普通话里的“子”已经发展出了多个义项，如“子弟”中的“子”大体上还具有指人的意思，但“瓜子”中的“子”是种子的意思，其他如“枪子”、“子猪”等词中“子”也都已经跟“子”的本义不一样。另外，从上面的词语中可以发现，普通话具有实义的“子”不能独立成词，必须和其他语素组合才能组词，是一个不成词语素。那么，“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虚化的呢？王力认为至少

在上古时代“子”就已经有了虚化的倾向，如“使吾二婢子夹我。”（《礼记·檀弓下》），其中“婢子”是妾的意思，“婢”承担了该词的主要词汇意义，“子”只有分析成词缀才较为合理^{[23][224]}。不过，这样的例子在先秦文献中还不太普遍。“子”作为词缀被普遍使用应该是在魏晋以后，比如“奴子”（奴仆义，《魏书》）、“种子”（《齐民要术》）、“犊子”（《晋书》）、“汉子”（《北齐书》）、“日子”（《南史》）、“蛤子”（《北史》）、“艇子”（《乐府诗集》）；唐代的很多诗歌里也有，如“豆子”、“燕子”、“笠子”、“帽子”、“手帕子”、“柚子”、“妃子”、“榻子”、“刀子”、“杓子”、“树子”、“眼子”、“手子”等等。自此，“子”作为汉语的一个重要词缀，其构词能力得到不断的发展。如构成表人的词有，“矮子”、“胖子”、“痴子”、“二愣子”、“二流子”、“姑子”、“舅子”、“老子”、“老头子”、“妹子”、“婶子”、“人贩子”、“傻子”、“瘦子”等等；构成表工具用具的词有，“剪子”、“扳子”、“篦子”、“杯子”、“被子”、“本子”、“斗子”、“房子”、“缸子”、“凿子”、“毬子”、“纽子”、“镊子”、“挑子”、“杌子”、“椅子”等等；构成表人或动物身体部位的词有，“鼻子”、“冠子”、“爪子”、“肠子”、“鼻梁子”等等；构成表示植物或植物果实的词，有“桃子”、“杏子”、“麦子”、“柿子”、“梅子”等等；构成表时间的词，有“日子”、“月子”、“阵子”、“一辈子”等等。

“儿”在古代汉语中是一个成词语素，意思是儿童、小孩的意思，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仍保留这样的意思，但是只能作为词根来构词，如：“儿童”、“健儿”、“儿子”等。“儿”作为词缀出现的时间比“子”要晚。直到唐代，汉语才有文献表明虚化的“儿”参与构词，如“燕儿”、“黄莺儿”、“蛤蟆儿”、“蜂儿”等，不过都是构成动物类的词语。由于“儿”本义是小儿、幼儿的意思，这些表示动物的儿缀词，到底指的是一般的动物名称，还是指幼小的动物，对于这一点，不少学者还持有争议。如，“燕儿”指的是一般的燕子，还是小燕子；“蜂儿”指的是普通的蜜蜂，还是小蜜蜂，还不能确认。直到宋代以后，文献中才有“小车儿”、“船儿”等较为可靠的“儿”作为词缀构词的例子。“儿”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构词能力也非常的强，在口语中有大量的儿缀词，并且在数量上比子缀词要多。有很多儿缀词更倾向于表示小的事物，如“花儿”、“草儿”、“小

狗儿”，跟子缀词对应时有明显的喜爱色彩，如“老头儿”和“老头子”，“鼻梁儿”和“鼻梁子”等。另外，儿缀词的口语色彩特别显著，有些口语色彩强的词会很自然的带上儿缀，甚至个别动词也带上了儿缀，如“玩儿”。

儿缀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发展比子缀更进一步。子缀在构词时是轻声的形式，有独立的音节；而儿缀在轻声的基础上已经发生了变异，即儿化。汉语儿化现象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儿缀的附着性产生了质疑。因为，汉语中常见的词缀都是自成音节的，但是儿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大量出现对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缀产生了冲击。要么修改词缀在语音形式上要求，即儿化作为一个卷舌特征可以作为词缀的表现形式，而不必须是音节；要么认为这些儿缀词中所谓的儿缀已经不再是词缀了，而是内部曲折的构词方法。

“头”的本义是“首”，指的是人的最上部或动物的最前部。“头”和“首”表示的语义相同，语音也十分接近，近代汉语的“头”逐渐替换了“首”。在现代汉语中“头”可以单独成词，也可以作为词根构词，如“头脑”、“头骨”、“剃头”等等。头缀出现在六朝时期，比子缀儿缀出现得要晚，如“膝头”（《水经注》）、“前头”、“后头”（《企喻哥》）、“钵头”（《张枯诗》）^[23]228-229。宋元以后头缀词就普遍出现了，如“锄头”（黄庭坚诗）、“念头”（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日头”（《西厢记》）、“房头”、“舌头”（《西游记》）等等。在现代汉语中，头缀在语音上的性质和子缀相同，也是轻声。

（二）方言学视角下典型词缀的功能和地理分布

汉语的语素“子”、“儿”、“头”都发展成为了词缀，从语用的角度看，词缀“儿”在普通话中的口语色彩更浓。但是，汉语各个方言的情况却各有不同，甚至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子”和“儿”在词义上较为接近，都有子女、小孩的意思，在普通话中就有“儿子”一词。不过，有很多的南方方言表示子女、小孩的词是“仔”、“崽”等，那么自然就没有“子”缀“儿”缀了。实际上，“仔”、“崽”等跟“子”、“儿”从语源上看应该是一致的。

头缀词在吴方言里比较普遍。以苏州话为例^[24]327。“头”作词缀时以轻声的形式附着在前字的后面，具体调值一般跟随前字变化。如“墙头”

（墙）、“纸头”（纸）、“锄头”（锄）、“砖头”（砖）、“竹头”（竹子）、“斧头”（斧子）、“被头”（被子）、“领头”（领子）等等；另外，“头”缀用在动词后表示有价值这一用法也比普通话要能产，除了“苦头”、“看头”之类外，还有“吃头”、“想头”、“去头”等。但是，“子”缀“儿”缀的分布在吴方言的南部和北部有所不同。北部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子”作词缀时以轻声的形式附着在前字的后面，具体调值一般随前字变化。如“鞋子”、“驴子”、“学生子”、“车子”、“角子”、“哑子”、“锅子”等等；但是“儿”缀词只有极少的几个，如“囡儿”、“筷儿”、“小娘儿”（小女孩）。南部吴方言的情况跟北部吴方言正好相反，儿缀词特别丰富，而子缀词则寥寥无几。以金华话为例，儿缀词如“豆荚儿”、“今日儿”、“金桔儿”、“枣儿”、“八哥儿”、“小丐儿”（男孩子）、“纽子儿”（纽扣）、“毛栗儿”（野生的栗子）等等；子缀词却只有“腰子”、“褥子”、“银子”等为数不多的几个词，不具有能产性。这种情况跟温州话大体一致，都是儿缀词丰富，子缀词极少。所不同的是，温州话的儿缀是轻声的形式，成音节，而金华话的儿缀是儿化的形式，是以鼻化的方式跟前面的元音融合。湘方言的情况跟苏州话的情况较为一致，子缀词和头缀词比较丰富，而儿缀词较为罕见，长沙话、娄底话都是这种情形。这也说明历史上吴楚相连，在词缀的发展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共通性。

梅县话是客家方言的代表，该方言的“儿”缀较为发达。“儿”缀音[e]，不但可以作名词后缀，如“蚕儿”、“凳儿”、“鸭儿”、“刷儿”、“靴儿”、“鸡儿”、“灯罩儿”、“笔套儿”等等；还可以附在形容词重叠式后面，如“面红红儿的”、“慢慢儿行”；还可以用在“动词+等”后面表示动作的进行，如：“食等儿饭”（正在吃饭）、“看等儿书”（正在看书）。子缀词极少，如“哑子”（哑巴）。“头”缀的构词能力跟普通话相当，但也有一些普通话没有的“头”缀词，如“日头”（太阳）、“钁头”（锄）等。赣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子缀词特别丰富。南昌话的“子”除了作名词的后缀外还有四个功能^[25]。如“子”缀可以附加在名词重叠式的后面：“角角子”、“瓶瓶子”、“脚脚子”、“屑屑子”等。如“子”缀可以附加在形容词重叠式后面：“胖胖子”、“瘦瘦子”、“慢慢子”、“乖乖子”，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化。又如，“子”缀可以加

在数量短语的后面表示数量小:“事不多,有三四个子人就够了。”“三四个”附加“子”缀后,其意为不需要太多的人,三四个即可。再如,“子”缀可以加在一些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轻:“你力气小,只挑得动那重子。”即说话人主观认为重的程度有限。南昌方言中“子”缀进一步语法化的现象已经超出了构词法的范畴,对认识汉语词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粤方言广州话中没有“子”缀或“儿”缀,与之相当的是“仔”,如“人仔”(小人儿)、“屋仔”(小房子)、“房仔”(小房间)、“妹仔”(小丫头)、“公仔”(小玩偶)、“煮饭仔”(小锅饭)、“歌仔”(山歌)、“哥仔”(小青年)、“友仔”(小家伙)、“狗仔”等。“头”从功能上来说跟普通话相当,可以做名词后缀:“木头”、“石头”、“猪头”、“骨头”、“钵头”、“兆头”;接在动词词根后:“呢本书冇乜睇头”(这本书没什么看头);方位词后缀:“上头”、“下头”、“前头”、“里头”。闽方言厦门话既有丰富的“仔”缀词,也有少量的“子”缀词,但是没有“儿”缀。仔缀词有“蒜仔”、“桃仔”、“窗仔”、“鸡仔”、“燕仔”、“娘仔”(蚕)等等;子缀词有“窗仔子”(窗格子)、“阿达子”(蜜饯)、“果子”等;有些“头”缀词也跟普通话不同,如“胆头”(胆子)、“摊头”(摊子)等。

官方方言在词缀“子”、“儿”、“头”的使用方面跟普通话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儿”缀词最为丰富,语音上的表现一般是儿化,也有一定数量的“子”缀词和“头”缀词,语音上的表现一般是轻声。不过,也有不少官话方言在词缀“子”、“儿”、“头”的使用方面跟普通话不尽相同。比如,江淮官话扬州话的“子”缀词占到了绝对的优势,如“点子”、“雹子”、“雪珠子”、“纽子”、“石头子子”(石子儿)、“星子”(细小的东西)、“初一子”(正月初一),儿缀词则极少,“头”除了有跟普通话一致的功能外,还可以作方位词的后缀,如“上头”、“外头”、“前头”等,还可以表示里面的意思,如“家头”(家里)、“教室头”(教室里)。西南官话武汉话的情况也跟江淮官话较为接近,跟普通话不同。武汉话“子”,如“雪子子”(霰)、“凼子”(坑)、“碓子”(舂米用具)、“嘴子”(嘴儿)、“水鸡子”(落汤鸡)、“瓷瓦子”(瓷碎片)、“堆子”“猫子”等等,“儿”缀词在口语中基本不出现,“头”缀词跟普通话则差别不大。

就官话方言而言,可以分为儿缀型方言和非儿缀型方言;儿缀型方言又分为儿化型方言和儿尾型方言。其中太原话处于儿尾型向儿化型过渡的时期,该方言的儿缀词既有儿尾的形式,又有儿化的形式。

表 2 汉语官话方言儿缀分布表

儿缀型方言	儿化型	北京 哈尔滨 济南 牟平 徐州 南京(老派) 成都 西安 乌鲁木齐 万荣 忻州	太原
	儿尾型	南通	
非儿缀型方言		扬州 武汉 贵阳 柳州 银川	

就非官话方言而言,词缀“子”“儿”“头”都有的方言不多,如杭州、黎川。其他的非官话方言可以分为有“子”无“儿”型方言和有“儿”无“子”型方言。有“子”无“儿”型又可以分为“子”型和“仔”型。其中萍乡话既有“子”缀,又有“仔”缀。

表 3 汉语非官话方言子缀儿缀分布表

有子无儿型方言	子型	苏州 上海 崇明 丹阳 绩溪 宁波 长沙 娄底 南昌 南宁 于都	萍乡
	仔型	广州 东莞 建瓯 福建 厦门 雷州 海口	
有儿无子型方言		温州 金华 梅县	

四、结语

词缀是汉语语法学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语法单位,从研究初期词缀类术语纷繁多样、莫衷一是就可见一斑。而赵元任、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等诸位大家对于汉语词缀的看法“小同大异”,则更加说明该领域值得下大力气去探讨。

词缀“子”、“儿”、“头”是汉语最重要、最典型的词缀,以此为汉语词缀研究的切入点可以为其他词缀的研究提供示范、少走弯路。汉语具有丰富的历代文献和复杂的地域方言,这为汉语词缀研究分歧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从普通话的角度看,“子”、“儿”、“头”从古代汉语的词根发展成为现代汉语的词缀,其中“儿”缀由成音节的词缀发展成为儿化词缀。儿缀词在普通话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甚至在语言交际活动中儿缀词还带有表小指爱的色彩,这一点是词缀“子”、“头”所不具备的。但是,这一发展结局并不能代表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儿”缀在汉语各个方言



中的发展是极度不平衡的,有很多汉语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儿”缀,而“子”缀(含“仔”缀)和“头”缀则几乎所有的汉语方言都具备。但是这三个词缀在普通话中的构词情况并不是汉语方言中的唯一类型。“头”是汉语方言中最为普遍的词缀,在吴方言及其周边方言中最为发达,不仅可以作为名词的标记,还发展出了很多句法上的功能。“儿”缀在官话方言中分布最为广泛,而在非官话方言中使用最广泛的是“子”缀(“仔”缀),与官话方言中“儿”缀相当的功能几乎都可以用“子”缀(“仔”缀)表示。“子”、“儿”、“头”可以做名词后缀使用,其功能有一定的共通性。即在汉语双音化多音化的过程中,词根可以选择“子”、“儿”、“头”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词缀,显然,不同类型汉语方言的选择则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 [1] 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 [2] 韩陈其.汉语词缀新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4).
- [3] 薛祥绥.中国言语言文字说略[J].国故,1919(4).
- [4] 尹海良.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
- [5]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
- [6]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
- [7]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 [8]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9]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 [10]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1]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2]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4]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特.现代语言学词典[M].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5]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16]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17]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8] 刘叔新.现代汉语描写词汇学(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9]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 [20]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21]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22] 徐通锵,叶蜚声.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3]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4] 汪平.苏州方言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5] 熊正辉.南昌方言的子尾[J].方言,1979(3).

责任编辑 君 羊

Divergen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ffix and Suggestive Approaches

CAI Hua-xi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we cannot reach a consensus on affix, especially complex terms of affix is right remarkable at the beginning. Grammarian Chao Yuanren, Lv Shuxiang, Zhu Dexi, Ding Shengshu ha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Chinese affix, but they only recognized a small number of Chinese affix, for example Zi, Er and Tou. There are rich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lex Chinese dialects, which provides a good guarantee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affix. We suggest that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ypical affix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ffix. So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affix and i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n the Chinese dialect, it is th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Chinese affix research.

Key words: affix; divergence; grammaticaliza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